

发现“东京大学在学证书”： 解开中国语言学理论奠基者胡以鲁之谜

大西克也、李无未

一百多年来,《国语学草创》(1912)作者,中国汉语现代语言学奠基者胡以鲁(字仰曾,1888—1917)的身世,一直存在着一些争议而令人感到疑惑的问题:一个是,其出生地到底在哪里?新版《辞海》说是宁波人,而1994年印行的《定海县志》说是定海人。二是胡以鲁进入东京大学的时间。大多数人都笼统地说,他在日本大学毕业以后进入东京大学学习,但究竟是哪一年进入东京大学学习的,没有人知道得更为详细。三是胡以鲁如何进入东京大学学习的,是考入还是审核录入,其程序如何?现有材料语焉不详。四是胡以鲁父亲是何人,从未有人提起。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争议问题,比如《国语学草创》完成与发表是在1912年、1913年,甚或是许多人说的1923年;《国语学草创》是普通语言学著作,还是“国语学”,即中国汉语现代语言学著作?《国语学草创》是否就是《言语学讲义》另一个版本?等等,这些问题,涉及面特别大,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理论学史研究无论如何回避不了,我们可以另写文章论述,应该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注：此像出自于沈兼士签名的线装本扉页。出版时间与出版机构不详。但从扉页所题：“十年苦学实劳母心，区区者篇敬为母寿”的表达来看，其“十年”应从1905年赴日本算起，出版时间应该在1915年）

在2019年5月至8月之间，厦门大学李无未教授在东京大学文学部中文科做外国人研究员，大西克也教授是其合作导师。2019年6月27日上午，在文学部部长大西克也办公室，李无未看到了厚厚的一本《文学部在学证书》装订册，排序为“コ册”。大西克也翻开已经用纸条标记好的部分内容之后，马上把装订册交给李无未。李无未随后看到的是，那张“在学证书”上用毛笔赫然写着“胡以鲁”三个字，这顿时让李无未大吃一惊，真的让李无未感到难以置信。大西克也解释说，在得到了李无未向他发出的寻找胡以鲁资料的请求后，他就马上让东京大学文学部主管学生档案的教务主任找出明治后期的资料。大西克也原来也在想，东京大学经过了1923年东京地震，几乎将东京夷为平地的“大灾难”之后，图书档案受损极其严重，好多珍贵文献荡然无存，是不是与胡以鲁相关的文献也遭到了如此命运？可谁曾想，这份“在学证书”文献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这让他深感意外。征得大西克也的同意，李无未马上用华为手机很郑重地拍下了这个珍贵的文献影像，二人以合著方式撰文，以供研究之用。

在學證書



宿所 小石川區指ヶ谷町 丁目 七番地 エルケン氏方
本籍 清國 浙江省 國寧波府 鄞縣 定海 廠村
平民族 胡耀男 胡以魯

明治二十一年
清光緒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生

肥人欄
羅馬字

右ノ者今般入學ノ御許可ヲ得候ニ付テハ同人在學中ニ係ル一切ノ
事件某等ニ於テ引受クヘキコト謹デ保證候也

但向後某等宿所移轉或ハ印章相改候節ハ速ニ届出ツベク候也

宿所 小石川區音羽町七丁目 拾番地
本籍 東京府武藏國墨江郡音羽町七丁目 拾番地

士族職業 帝國大學講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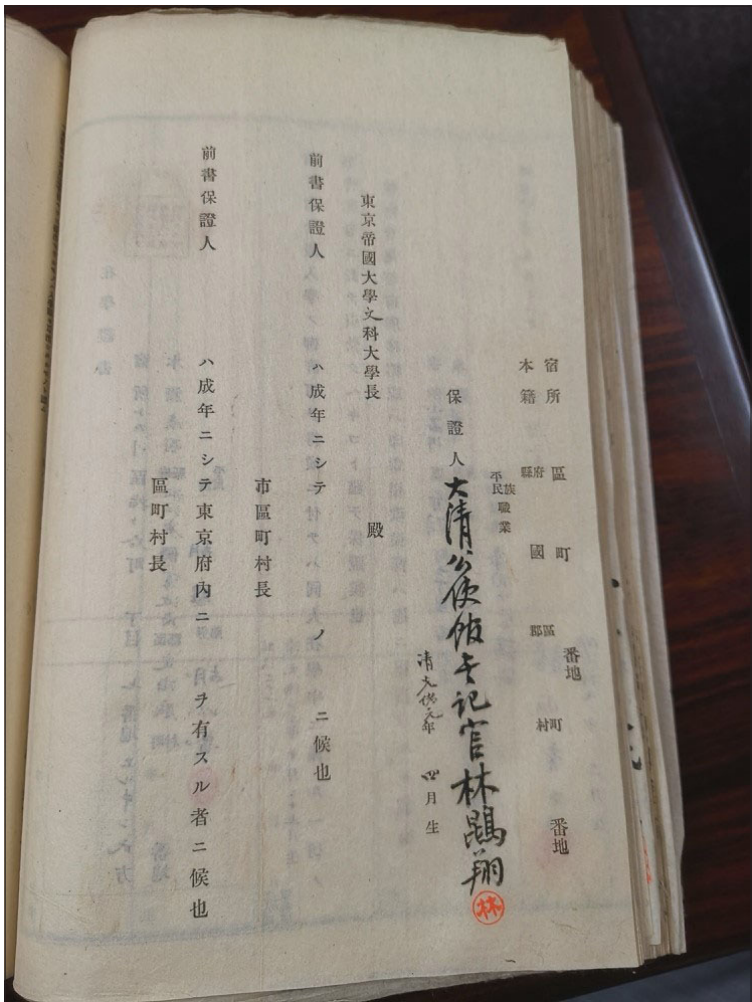
保證人

鳩山秀夫

明治十七年 二月生

明治二十年 九月十六日

年 月 日生



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学長

前書保證人

殿

ハ成年ニシテ

ニ候也

市區町村長

前書保證人

ハ成年ニシテ東京府内ニ

自ラ有スル者ニ候也

區町村長

宿所
本籍

區

縣府
平民職業

町

郡區

番地

村町

番地

保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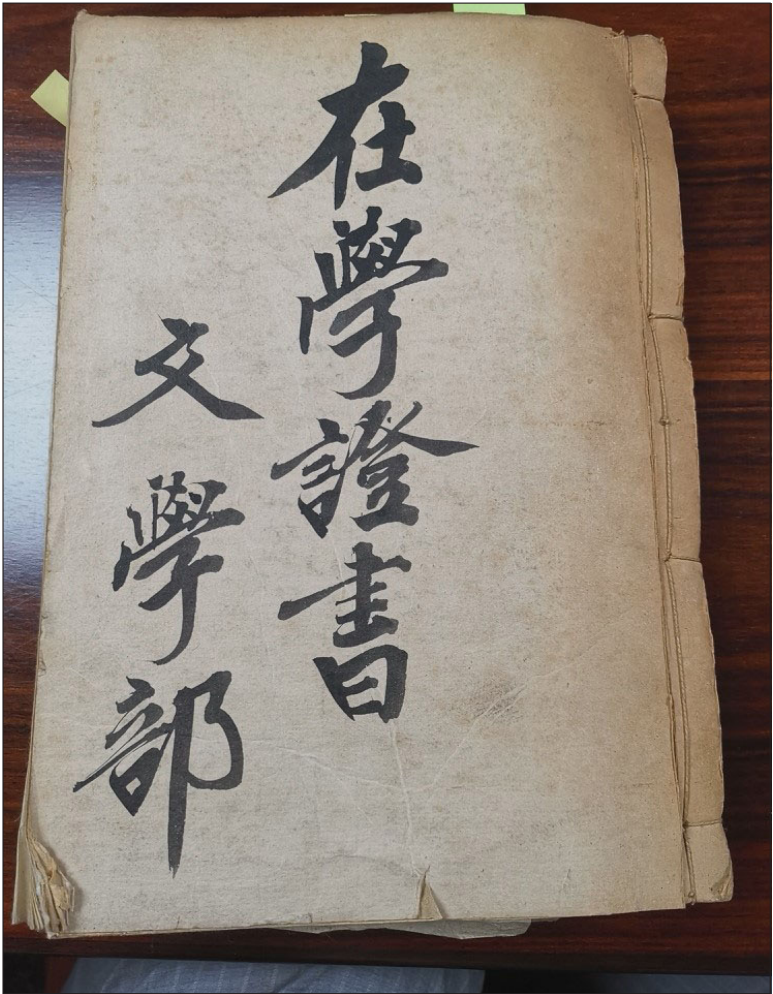
大清公使館書記官 林鷗翔



清大保元

四月生





李无未和大西克也都处在一种“发现”之后的情绪高涨而无比激动状态之中，当然还要用心详细讨论这张“在学证书”所蕴含的信息到底是什么。

一、胡以鲁东京大学“在学证书”所蕴含的信息

我们仔细研究了这份“在学证书”，进一步发现，它所蕴含的信息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有这样几个方面内容非常突出：

其一、解决了胡以鲁出生地问题。“在学证书”明确记载着胡以鲁本籍在宁波府定海厅。这等于是将过去的两种说法合二而为一。可见，两种说法都没有大的错误，但又概括得都不很准确。

其二、胡以鲁出生的时间是明治 21 年，中国是光绪 14 年 10 月 25 日，即公元 1888 年 11 月 28 日。记载精确到如此地步，这是过去人们所不可想像的。

其三、胡以鲁的父亲是谁，叫什么名字过去并无史料说明，而“在学证书”明确说明是胡燿。

其四、胡以鲁进入东京大学的时间是明治 42 年 9 月 16 日，即 1909 年 9 月 16 日。比起过去的胡以鲁“在东京大学留学”的笼统说法更为准确了。

其五、进入东京大学学习的日本方面保证人是“东京帝国大学讲师”鸠山秀夫。鸠山秀夫生于明治 17 年 2 月，即 1884 年 2 月。据资料（详下）鸠山秀夫生于 1884 年 2 月 7 日，也是很吻合的。

其六、清国方面保证人是大清公使馆书记官林鲲翔，生于光绪元年。这些信息对于解开胡以鲁身世与学习经历之谜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由此了解到，胡以鲁于 1888 年 11 月 28 日生于宁波府定海厅，父亲是胡燿。而胡以鲁考入东京大学，是由“东京帝国大学讲师”鸠山秀夫于 1909 年 9 月 16 日作保证人而入学的。

结合相关史料，我们对胡以鲁日本留学经历有一个概括的了解。据《申报》宁波史料（1872-1949）记载，《申报》于 1905 年 3 月 15 日刊登了一份“甬江考取出洋师范生名单”，称：“宁波府属考试出洋学习师范生现经府尊喻庶三太守录取若干名，榜示署前。兹将姓氏录左：陈滋镐、宋庆、马裕藻、胡桂显、胡虞舜、魏炯、江镜清、韩禹梁、胡以鲁、张宗礼、虞恺、于

斯威、董耀熙、金士显、董辅清、李宸黼、严彭龄、孙丕忠、王鹏、何后川、虞翼祖、郭学韶、李焕华、金本树、唐保诚、王欧声、孙星环、俞作屏、毛秉礼、江泽深、陈绍祥、叶秉成、夏昌宇、孙汉升、孙锡元、毛士奇、张鸿仪、陈宗、卢鸿勋、洪钟美。”胡以鲁名列其中，和后来的北京大学名教授马裕藻（1878—1945，字幼渔，祖籍浙江鄞县（今宁波鄞州），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师从章太炎）是同一时间留学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胡以鲁进入东京日本大学法政科的时间，应该在1905年9月前后。同一年赴日本留学的还有黄侃、杨树达、李叔同等人。其东京大学“在学证书”上也表明，胡以鲁住在小石川区指ヶ谷町七番地アルケン氏（今指ヶ谷小学校附近），与鸠山秀夫住在小石川区音羽町七丁目拾番地（护国寺）相距不算太远。很巧的是，1906年章太炎到东京后，住在东京小石川区新小川町（许寿裳说，是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牛込区可能是小石川区之误），距后乐园很近，在今地铁饭田桥站西北。曾与苏曼殊、黄侃等住在同一幢楼中，离胡以鲁的住处也很近。章太炎借东京神田区大成中学讲堂，办起“国学崛起社”，定期讲授文字学、音韵学、庄子、中国文学史等课程，胡以鲁也经常去听讲，因此，给他打下了良好的中国传统小学，即传统语言文字学的雄厚基础，由此成为章太炎在日本的得意弟子之一。我们也由此才明白，为何后来胡以鲁放弃法律学而改为专攻语言学（当时称博言学）之原因，恐怕直接受到章太炎的传统小学教育影响，应该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看到这张东京大学“在学证书”，我们也要问一个问题，即日本人鸠山秀夫为何能给胡以鲁当进入东京大学（当时称东京帝国大学）学习“语言学”当保证人？鸠山秀夫又是什么人？

胡以鲁与鸠山秀夫相识过程我们无从知晓，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是学法律学出身。胡以鲁在日本大学法政科学习的是法律，鸠山秀夫在东京大学也是属于法律科学生。专业领域相同，就有了相识的机缘。按照当时日本大学接收外国留学生学习规定，必须有一定实力与地位的人才能做“身元担保”，即便是现在，到日本留学程序也是一样。所以，由鸠山秀夫做他的保证人也就不奇怪了。鸠山秀夫能给胡以鲁当保证人，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这肯定与鸠山秀夫不一般的身世与家世有直接关系。

据秦郁彦《日本近现代人物履历事典》等资料，鸠山秀夫（HATOYAMA

Hideo : 1884年2月7日—1946年1月29日) 东京都出身, 190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法律学科(德国法科), 因为成绩优异, 留在东京大学任讲师。不久, 留学德国、法国。他于1916年升任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教授。1926年任专职律师。1932年任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妻子千代子则是曾任东京大学校长的数学家菊池大麓的女儿。鸠山秀夫是日本最为著名的法学家之一, 其学术专长为民法学, 著有《日本催权法(总论)》、《催权法各论》、《日本民法总论》等著作。淡路刚久《民法学の歴史と法科大学院における民法教育》称, 从日本明治末期到大正时期法院审判的依据就是鸠山民法学。可见, 其学术成就巨大, 影响深远。

鸠山秀夫的“家世”十分显赫。其父亲鸠山和夫(1856年5月6日—1911年10月3日), 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与耶鲁大学留学, 获得了博士学位, 历任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教授、教头(法学部长)、日本外务次官、众议院议长、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校长。而母亲鸠山(多贺)春子则是著名教育家, 创办共立女子职业学校(共立女子学园)。哥哥鸠山一郎(1883年1月1日-1959年3月7日), 190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法律学科, 为日本政治家, 日本自由党总裁, 日本第52、53、54任内阁总理大臣。鸠山一郎长子鸠山威一郎, 曾任日本外务大臣。而孙子鸠山由纪夫曾任第93届内阁总理大臣、前日本民主党常任干事会代表(党首)等职。很显然, 鸠山秀夫处于一个影响日本政坛150余年的“世家贵族”之中。

鸠山秀夫以东京大学讲师身份, 再加上“显赫家世”背景, 为胡以鲁这个中国留学生做担保人, 岂有不成事之理? 东京大学文科大学语言学科当然乐于招收胡以鲁这个来自中国浙江定海的学生。鸠山秀夫之于胡以鲁, 即是异国知心朋友, 又是他后来语言学学术发展道路上的“福星”。过去, 学术界很少注意到鸠山秀夫对胡以鲁研究语言学学术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也是囿于文献资料局限而很难知晓这一点, 不足为奇。但随着胡以鲁东京大学“在学证书”文献的发现, 这个“谜底”终于能够解开, 真相大白于天下。

当时清国方面保证人是“大清公使馆书记官”的林鯤翔, 他生于光绪元年(1875), 浙江吴兴(今属湖州)人, 但其家世及本人生平情况, 我们知道得不多。他写有《半樱词续》词集, 在留日期间主编过《法政杂志》, 拥护君主立宪政体。发表过《法律理论与法律事实》等文章, 中国近代分析法

学的开创者人之一。由林鯤翔当保证人，也说明，胡以鲁与当时法律学留学生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

二、胡以鲁东京大学“在学证书”及与上田万年教授的“关联”

这张东京大学“在学证书”标明的初期情况可以与其后期的语言学专业学习及研究相交“证明”，并且这两个历史阶段相“关联”，就构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胡以鲁东京大学语言学生活历程的“连续统”。在这当中，要想真正获取胡以鲁东京大学语言学学习与生活过程信息，就必须提到一个关键性人物，即其学术上的导师上田万年教授。许多资料已经表明，胡以鲁入学后，师从日本现代语言学第一人，东京大学教授上田万年。他利用最为优越的学习与研究的条件，接受东西方先进语言学理论训练，这就为他后来从事中国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东京大学上田万年教授是什么人？我们通过查阅资料知道，他可不是一般人，是日本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上田万年的弟子新村出写有《上田万年先生年谱》（1984）。近年山口谣司撰写《日本語を作った男 上田万年とその时代》（2016），详细描述他的生平和对国语政策的贡献。

上田万年（UEDA Kazutoshi，1867年2月11日 - 1937年10月26日）是日本的国语学者、语言学者。担任过东京帝国大学国语研究室第一代主任教授、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校长和文学部长。曾任日本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临时假名遣调查委员会委员、国学院大学校长，以及1908年帝国学士院会员。又是小说家円地文子的父亲。培养出新村出、小川尚义、桥本进吉、金田一京助、龟田次郎、东条操、小仓进平、安藤正次等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第一流学者。上田万年发表过《国语论》、《为了国语》、《国语学十讲》、《语言学》、《国语学史》等重要著作。

上田万年的求学经历也很不一般。1888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毕业后，受其德国老师张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教授的影响，奔赴欧洲语言学研究的中心德国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以及法国巴黎大学留学。1894年回国，开始建构自己的东洋语言学理论体系，迅速影响到了日本及东亚各国语言学界，推动了东亚语言学的全面进步与发展。上田万年《语言

学》、《国语学史》等承袭其德国老师甲柏连孜《语言学》、《汉文经纬》学术思想，但不受其理论束缚，也接受德国布鲁格曼等西方学者的影响，形成独特的东方语言学“国语学”学术体系。

上田万年“国语学”思想直接影响到了胡以鲁“国语”语言学意识的形成，由此，触发了他建构中国国语学的灵感。在东京大学读书期间，既已完成《国语学草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借鉴东西方语言学理论而具有完整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的汉语研究著作。《国语学草创》初稿我们已经很难见到，黎锦熙《国语学讲义》（1919）称，他见到了1912年版，还看到了他的《言语学讲义》写本。《国语学草创》不但深刻地影响到了黎锦熙、杨树达，还影响到了后来的乐嗣炳、王古鲁、沈步洲、张世禄、周辨明等学者，这在中国汉语语言学理论史上，是一个奇迹。东京大学“在学证书”的发现，则为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理论“原型”，以及与上田万年“国语学”之关联研究，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学术契机。

除了上田万年，还有胡以鲁与其前后东京大学语言学教师及学生的“关联”，也是应该注意的。我们了解到，此时，保科孝一已经是东京大学语言学讲师。不久，小仓进平也成为国语研究室助手。金田一京助、后藤朝太郎也在胡以鲁入学的前一年毕业。据《上田万年年谱》，东条操早胡以鲁一年入学。在胡以鲁三年级时，即1910年，桥本进吉任上田万年学术助手。按照东京大学本科三年学习时间的正常规律，胡以鲁应该在1911年9月之前毕业。我们不禁要问，《国语学草创》是胡以鲁东京大学语言学科的毕业学位论文吗？如果不是其毕业论文，他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作此书的？我们认为，胡以鲁写作《国语学草创》肯定是离不开上田万年及其东京大学语言学群体环境的学术熏陶，也与他此时业余时间向章太炎学习中国传统小学息息相关，这给他打下坚实的小学基础。西洋语言学、日本东洋语言学、中国传统语言学“三位一体”，铸就了《国语学草创》的语言学理论学术灵魂，这个学术“关联”，无论如何是应该成立的。

三、东京大学“在学证书”外胡以鲁“家世”再探寻

涉及到胡以鲁家世，通过东京大学“在学证书”，我们知道了他的父亲

名字叫胡燿。尽管我们遍寻其可能有的线索，还是对胡燿情况仍然是一无所知，当然更不知道他的母亲名字，以及他的夫人名字情况。

胡以鲁有个弟弟，名字叫胡以庸。因为是个十分著名的金融界名人，其个人资料却是比较容易找到的。胡以庸(1895年—1968年)，字定梅，号梅庵，1949年前中国银行家、收藏家，中国通商银行重要人物。这可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现代人物资讯整合系统中的中国征信所：《上海工商人名录》(美华书局，1936年)介绍。1935年，中国通商银行改制“官商合办”，胡以庸出任副总经理，亦任浙江通商银行总经理。这可能与曾任汪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其同乡傅筱庵的推举有关。后胡以庸出任中央银行副经理，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杜月笙出走后代理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1941年春，中华民国“央行”因二战西迁重庆，胡以庸滞留上海，同年12月9日，胡以庸在上海主持会议宣布央行上海分部业务解散。1945年，国民政府为恢复西南二战后经济，成立川康银行，胡以庸任总经理至1949年2月。1949年迁居香港。1968年8月，在香港逝世。胡以庸的夫人李婣娟，是上海宁波帮“小港李家”家族的地产大亨李如山的二女儿。胡以庸生前对收藏极为重视，和张大千是挚友，生前收藏张大千书画佳作多幅。比较有名的，比如《蜀道秋云图》、《柳下倚树寻春图》等。其他则有《苏文忠公遗砚拓本》、《松溪话别图》等。

过去，人们极少提到胡以鲁后代身世情况，我们也更不知道他是否存在后代这件事。幸运的是，我们在网上极力搜索，还真的找到了胡以鲁后代，即他的儿子胡实声与胡远声的一点儿线索，这也算是研究胡以鲁“家世”后代情况的十分重要的发现。

上海海关史博物馆收有胡实声的“口述史”资料，这在网上很好找。胡实声“口述史”资料称：胡实声，1913年生，男，浙江定海人。1936年毕业于北平税务专门学校内勤班。税务司设置时期担任江海关(上海海关)、江门关(广东江门海关)税务员。1936年9月，胡实声与彭瑞复、朱人秀等在中共江苏省委职委领导下组建了中共江海关(上海海关)地下党支部，胡实声担任第一届地下党支部书记。曾介绍知名革命烈士茅丽瑛入党。在海关“护关运动”等工作中做出了卓越贡献。离休后，胡实声同志担任“税专校友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副会长，第二届理事会会长，负责编辑《税专校

友会简讯》等工作。2014年10月15日去世，享年101岁。父亲，胡以鲁，字仰曾，浙江定海人，晚清赴日留学生，归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之一。

沿着这个线索，我们力图发现胡以鲁的相关线索，但很令人失望，因为所获有限。胡实声“口述史”称，在胡实声6岁的时候，他父亲胡以鲁过世了，是其叔父胡以庸将他扶养成人。胡以庸当时是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通商银行总经理。胡以庸成了“养父”，当然给他的感觉是，胡以庸“在家里说话是很有地位的，不容易违背他的意愿。”所以，胡以庸对他影响很大，其对父亲胡以鲁反而没有什么印象。胡实声的姨夫盛丕华，是民国时期上海商界领袖人物，建国后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副主席，上海市副市长。其表弟，盛康年，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发起人之一，曾任政务院参事，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第二商业局副局长，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与其关系十分密切，来往甚多。

胡远声被称作“胡以庸侄子”，生卒年不详。与胡实声一样，也是“寄养”在叔父胡以庸家里。据资料，胡远声曾在胡以庸任总经理的中国通商银行当襄理。他于1960年任新组建的上海财经学院（后来改称上海财经大学）的副院长，属于上海财经大学的建校元老之一。1964年到1966年以副院长身份主持工作。1981年到1983年，又担任上海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

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侯祥麟（1912-2008）自述《我与石油有缘——侯祥麟自述》（2001）提到，1928年，他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高中学习时，曾与胡实声、胡远声同班（6-7页）。1930年9月初，和胡远声等人一起考入了燕京大学，1935年毕业（7页、15页）。1936年在上海，侯祥麟与胡远声等人组织了读书会，学习进步理论书籍。这表明，胡远声毕业于燕京大学，但具体什么专业没有明说。

有关胡以鲁之子胡实声、胡远声的其他情况更是无从而知。也许今后还可以再找到胡实声、胡远声的后人线索，但估计，从胡实声、胡远声后人身上也不会得到太多的与胡以鲁关系密切的“可观”信息。

四、胡以鲁诗作及相关生平事迹考

胡以鲁留传下来的语言学论著不多，只有《国语学草创》一本书。黎锦熙提到的另一本书，即在北京大学讲课用的《言语学讲义》，我们也无从知道其模样如何，迄今仍然属于“待考”之列的难题。仅仅靠《国语学草创》一本书“传天下”，胡以鲁会给人们的印象是刻板的，单一的。如果能够找到语言学之外而与胡以鲁个人情感生活相关的文字记录，是不是可以使我们心目中的胡以鲁形象立刻“鲜活”起来？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2012）第26章“南京光复”提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留日同盟会骨干丁怀瑾回国组织“敢死队”直捣南京，击溃张勋保皇军。后来，他写有《辛亥光复沪宁记》记载其事。其中写到胡以鲁在日本东京为之“赠词”壮行事，非常感人，亦可见胡以鲁爱国情怀：“辛亥秋，余自日本偕同志返沪滨，组织敢死队，宁波留日同学胡以鲁（号仰曾）赠词以壮行色，兹录其词及序：石生先生组决死队回国，参与光复重任，奉此词以壮行，并同队诸志士，仰曾敬赠，词曰：秋风肃肃送君新桥（日本东京车站之名），行矣哉故国非遥，恢复中华在崇朝；行矣哉气爽秋高，落红不是无情物，为国捐躯此七尺。”其词豪情满怀，表现了胡以鲁性格特征的另一面，“志士仁人”形象跃然纸上。从研究胡以鲁当时“行迹”来看，直到1911年11月，胡以鲁还在日本，并未回国。

胡以鲁应该是在1912年初，即中华民国建立后才回国的。回到中国后，胡以鲁都做了些什么？任何种职务？这也是需要探讨的。《今日定海》刊载孙峰的文章，说胡以鲁，回国后，在浙江高等学校当教务长，后到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担任主任教员。1914年，胡以鲁担任当时司法部的参事。干法律老本行，也许这就是他的主业，胡以鲁在日本大学学习法律学，又是法学学士，为他顺利回国就业提供了便利条件。虽然如此，他并不满足现状，还是念念不忘自己所热爱的语言学教学与研究事业，于是就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应聘当起了语言学教授。这个语言学教授的“行头”，似乎和当年鲁迅在教育部任佥事，又兼任北京大学等校教师是同一个运行模式。

王晓明《北京高师——国语运动的发祥地》（2002）说，早在1913年，

北京高师的胡以鲁教授就率先开设“国语学”课程。1915年，他又协办“注音字母传习所”，并特别在高师附小设“国语讲习所”，专教注音字母和国语。这是谈胡以鲁与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北京高师的学术渊源关系。王晓明把他当作北京高师的教授也是有文献依据的。

但胡以鲁并不是那种专心在北京高师教书的“主儿”。1914年9月，胡以鲁承担了北京大学语言学教学工作，这件事也可以找到相关文献证据。吴思远《辜鸿铭出入北大及生辰考述》（2019）提到1915年12月《教育公报》中《北京大学分科暨预科周年概况报告》，里面记载到：“悉仍旧三年九月以后，因开新班分科，添聘教员二十三员，预科添聘十五员，兹悉分列于下：文科：陈大齐，担任伦理学、心理学、哲学概论；黄侃，担任词章学；阿得利，担任英文学；马叙伦，担任宋学、伦理学；辜汤生，担任文学概论；崔适，担任公羊学；周典，担任英文；胡以鲁，担任言语学；朱希祖，担任中国文学史；夏锡祺，担任美学。”与辜鸿铭、黄侃、马叙伦等并举于第一流师资之列，可见，当时的北京大学是十分看重他的学术的。他能够担任现代科学的一个门类语言学课开设任务，也是一个前此所无的壮举。

但据说，胡以鲁在北京大学开设这个语言学课程，因为现代语言学思想意识太过于超前，超出了人们的接受心理预期，老师与学生都不理解语言学“内范”与“外范”内涵。因为思维方式不是传统小学式的，就很难赢得人们的理解与认同，学生与老师对他的课有所议论，尤其是与某些老师在言语上还发生了冲突，胡以鲁顿时陷入了巨大的迷惘与矛盾之中。此后，胡以鲁身体“每况愈下”，渐渐病入膏肓，于1917年因病去世，仅仅就活了29岁。我们用“天妒英才”来做比喻，是再恰当不过了。胡以鲁发表“等身”论著已经不可能，又只有那么一本著作《国语学草创》传之后世。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学术“谱系”与“领地”，更没有后继门徒们的热烈“追捧”、“渲染”与“维系”，死后之境况凄凄惨惨，寂寞冷清，被遗忘于历史上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中已成为事实，其命运可想而知。我们很难发现当时描写胡以鲁去世时人们争相“痛悼”情景的资料，学者们悼念与回忆胡以鲁的文字少之又少，显得境遇十分可怜。只有从大学者孟森留下了几句挽联可以找到些许安慰。孟森《挽胡以鲁》写到：书到今生始读，无此兼通，京洛相逢，每对风流疑宿世；天之将丧斯文，难为后死，英贤不禄，可怜弩钝

转长年。

孟森是中国近现代史学术大家，属于学术上的勇于“开疆拓土者”。《心史资料》、《明史讲义》、《清史讲义》是其成名之作，尽管如此，孟森的研究领域与现代语言学研究关系不大。孟森是1902年去日本法政大学留学的，1905年就学成回国了，由此可以推测，孟森在日本与胡以鲁很难有所交集。孟森所述“京洛相逢”，也应该写的是其回国以后的事情。他的挽联文字不多，感叹着胡以鲁“天丧风流”命短，而有的人却“弩钝”长寿。字里行间没有特别“哀痛与惋惜”之处。为何胡以鲁死后没有构成王国维“投湖自尽”后的“天下齐悲鸣”的非凡景象，却遭遇“无知己悲悯”，孤零零一个人长眠地下，不知“魂归何处”而显得“寂寞开无主”？这也是值得后人去研究去思考的。

人们都说胡以鲁是章太炎的得意门生，主要源于章太炎1913年为《国语学草创》所作序言，在序言中，章太炎呈现了对弟子的“溢美之辞”。章太炎说：“文学士胡仰曾（胡以鲁字仰曾），自帝国大学博言科得业归，著《国语学草创》十篇，本之心术，比之调律，综之词例，精微毕输，黄中通理，其用心可谓周矣！夫含识之类形有燥静，故言有舒促，庄生论天籁极之，且莫之所繇，生语学之精莫过此者。”“仰曾综贯大秦驴唇之书，时时从余讲论，独有会悟。今见其书乃为此合音理，别其舛舒，音有难喻，以珊斯克列及罗甸文参伍相征，令古今华裔之声奄然和会，斯治语学者所未有也。”“今异域交通殊语瑰音粲毕效继，是以后殚精穷贯，以为国语 馥 灵舒光者，非仰曾谁与赖焉？”章太炎这个评价是出奇地高，已经把胡以鲁《国语学草创》作为阐扬“国语学”的最具创意的代表性著作来对待，好像胡以鲁的成就与黄侃一般高，非常令人惊奇。但有一个传闻值得深思，章太炎晚年自定《弟子录》，他所承认的弟子有“约计五十人左右”，但却不见胡以鲁名字。许寿裳回忆起，在日本东京听章太炎讲课学生中，有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黄侃、朱祖延，却唯独不见胡以鲁。在章太炎弟子门生的庞大阵容中，胡以鲁既不是“四大天王”之一，也不是“八大金刚”之一。亦可见胡以鲁在章太炎门生中的地位是不高的。这也透视出一个问题，即章太炎与胡以鲁的关系，无论是从个人“私谊”，还是从学术思维方式，一定是“若即若离”的，只能落得个勉强列入“章门弟子”之列地步。这也是胡以鲁特立独行而命运

不济的面目真实写照。

由发现东京大学“在学证书”，进而引出我们对胡以鲁个人身世与家世的思考，还有很多“考之而不确”的问题有待于深究，限于篇幅，笔者只能就此打住了。

参考文献

1. 胡以鲁《国语言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
2. 秦郁彦《日本近现代任务履历事典》，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
3. 淡路刚久《民法学の歴史と法科大学院における民法教育》，《学术动向》，2006年10月号。
4. 黎锦熙《国语言学讲义》，商务印书馆，1919。
5. 新村出《上田万年先生年谱》，上田万年《国语学史》，新村出笔录，古田东朔校订，教育出版，1987年，シリーズ名讲义ノート。
6. 山口謠司《日本語を作った男上田万年とその時代》，集英社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2016。
7. 中国征信所《上海工商人名录》，美华书局，1936年。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现代人物资讯整合系统，<http://mhdb.mh.sinica.edu.tw/mhpeople/bookImage.php?book=8>
8. 上海海关史博物馆收有胡实声的“口述史”资料：<https://new.qq.com/omn/20171224/20171224B0356L.html>
9. 上海财经大学官网：<http://www.shufe.edu.cn/41/list.htm>
10. 侯祥麟《我与石油有缘——侯祥麟自述》，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
11.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商务印书馆，2012。
12. 孙峰《我国早期的语言学家——定海籍赴日留学生胡以鲁》，《今日定海》2015年8月7日版。
http://jrdh.zjol.com.cn/html/2015-08/07/content_130385.htm
13. 王晓明《北京高师——国语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14. 吴思远《辜鸿铭出入北大及生辰考述》，《国际文化》第477期，外研社，2019年5月15日。

大西克也，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研究科教授。

李无未，东京大学文学部外国人研究员，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